

● 陈嘉庚丛书

陈嘉庚 与 精神文明

《陈嘉庚丛书》

陈嘉庚与精神文明

厦门市党史研究室
集美校友总会
集美学校委员会

合编

骆怀东 王 祉 陈少斌 著

1994年6月

目 录

陈嘉庚与精神文明	骆怀东 (1—13)
审慎扬弃 择善而从	
——谈陈嘉庚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	
.....	王 祉 (14—25)
珍贵的遗产.....	陈少斌 (26—31)

陈嘉庚与精神文明

骆怀东

文明，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各国的社会发展史，都证明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文明也由低到高地发展着。千百年来，多少革命的仁人志士经过不懈的努力，把人类文明不断向前推进。

被毛主席同志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1874—1961），在他八十七年的生涯中，经历了中国满清封建王朝的统治，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历史阶段，又在海外经历了世界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在这中国、东南亚以至整个世界发生大动荡、大变化、大转折的历史时期，陈嘉庚始终随着时代巨轮而前进，站在进步的、文明的行列。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陈嘉庚都身体力行地倡导精神文明，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做出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一、“一个国家读书的国民越多，教育就越发达，文明的程度就越高”

文化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和结果。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文化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石，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基础。一般来讲，文化程度越高，文明程度也越高。而要提高人们的文化程度，最重要的手段是抓好教育工作。

古往今来，普天之下，有多少慈善家慷慨捐款，以造桥修路，设馆办学。而陈嘉庚的办学高于一般的慈善家者，在于他并非是一般的慷慨好施，而是具有更崇高的指导思想。用他的

话来说，他对教育事业那样殚精心力，“非如慈善家之有怀念。”他倾资办学，是出于开发智力，提高人类文明水平的战略思想。

陈嘉庚对兴办教育的主导思想，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陈嘉庚认为，教育的发达水平，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志。他说：“我们办学校，最好免费生越多越好，这样才会使穷苦子弟有更多的读书机会。一个国家读书的国民越多，教育就越发达，文明的程度就越高。”

陈嘉庚在新加坡经商的实践中，接触了资本主义的文明，对先进的西方列强和落后的中国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他很早就指出：“英美德法诸国男女不识字者百人中不满三十人，我国国人中则占九十六人，识字者仅百人中四人而已。呜呼，此人格欲立国于世界而求免天演淘汰，其可得乎？”人们的文化教养又反映在社会风貌上。他曾说，一个文明的乡村，一入夜往往有三声：读书声，打拳声，弦管声。社会风气不好的乡村，则听到的是打牌、赌博、猜拳声，等等。

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陈嘉庚回到故乡，曾到附近各乡村视察，“见十余岁儿童成群游戏，多有裸体者，几将回复上古野蛮状态”，“如不改善，十数年后，岂不变成蛮野村落者乎？”还有什么文明可言？他“触目心惊，弗能自己”认为兴办教育是“当前急务，而且决心焉。”于是他于1913年1月创办了集美小学，开始了崭新而艰难的兴办新学的事业。

(二)陈嘉庚认为，教育是培养人才的百年大计。他曾明确指出：“打倒列强靠枪，推翻满清靠革命，教育乃百年树人，不能立即拯救国家于危亡，这是事实；然而，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

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基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我们办学校，不能有地方界域之见。我们办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国家造就人才。”

对师范人才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陈嘉庚有足够的认识。他认为，“师范是教育的基本”，“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辛亥革命后陈嘉庚回国，看到祖国教育十分落后，师资奇缺，“默念待力能办到，当先办师范学校，收闽南贫寒子弟才志相当者，加以训练，以挽救本省教育之颓风。”在兴学过程中，他一直把培养师范人才放在首位而极力加以提倡。他一生中兴办的师范学校规格齐全。在集美创办了普师、女师、简师、幼师、高师和乡师等各类师范学校；在厦门大学专门设立师范部；在海外创办南侨师范学校。

陈嘉庚还认为，要从根本解决振兴祖国的问题，还应该培养众多的高级专门人才。1919年，他在筹办厦门大学的通告中强调指出：“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专门学识，不足以躋等而达。”在二十年代，他又进一步指出：“何谓根本？科学是也。今日世界，一科学全盛之世界也。科学之发展，乃在专门大学。有专门大学之设立，则实业教育政治三者人才，乃能辈出。”

陈嘉庚不但兴办学校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而且还寓培养人才于个人营业之中。他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在企业走下坡路时仍竭力投资扩充橡胶制造厂时说：“余对制造厂不惜垫资扩充者，以二十世纪为树胶之时代，日本小国尚有大小胶厂四百多所，以我国之广大竟无一相当树胶厂。新加坡系产胶区域，政权虽属英国，所需男女概我华侨，对于化验制造各机器，可

臻完备，出品种类亦多，可以训练职员工人，如师范学校之训练学生，俾将来回国可以发展胶业。愚于个人营业之外，尚抱此种目的，故不惜资本，积极勇进。”正是出于这种培养人才的指导思想，所以在橡胶制造厂无利可图时，他仍继续扩充，宁可让营业受损失，也要多培养一些橡胶制造业的专门人才，犹如办学校之付校费。其远见卓识和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对人才的培养，陈嘉庚不但注重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而且强调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他指出：“为人有道德毅力，便是世界上第一难得之奇才。”“做人最要紧是有是非，分别是非，不但对国家如此，就是个人也是一样。无是非就不算是人。辨别是非，是做人的基本条件。”“教育不仅读书识字，而尤以养成德性，裨益社会。”

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是人的建设。在几十年前，陈嘉庚就如此重视人才的建设，可见其高瞻远瞩。

（三）陈嘉庚认为，教育是物质文明的根本。早在二十年代，陈嘉庚在分析当时西方列强物质文明发达与我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时指出：列强在经济上发达，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各种经济原理，对于工业、农业、交通、银行、保险等知识，“莫不洞若观火，而具有世界之眼光”。“我国商业之不振，推其原故，地非不大也，物非不博也，人非不敏也，资本非不雄且厚也。所独缺乏者，商人不知商业原理与常识耳。”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盖商战也，而学战已寓其中焉”，“补救之法，莫善于兴学。”“教育不兴，实业不振”，“教育为强国之本。”

陈嘉庚之所以对职业学校特别重视，并创办了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职业学校，其指导思想是他认识到“实业与教育，大有互相消长之连带关系。”他要以兴办教育来振兴实业。

如他创办农林学校,是考虑到“我国素称以农立国,然因科学落后,水利未兴,改良无法,故收获不丰,民生困苦,本省虽临海,农业实占一大部分,尚缺农林学校,以资研究改良。”他创办航海学校,是看到我国“所有船舶之数尚不足与最少船舶之国比拟,甚且数十国航业注册我国竟无资格参加”,认为“欲振兴航海,必须培养多数之航海人才。”

1919年7月,陈嘉庚在筹办厦门大学的演词中也很有远见地指出:“查我国中现称大学者不下十余所,强半为外人所创办,究其内容不过神学、文学、医学等科目,余若农工商等科关系社会经济之发展,为国家生存上所不可缺者,则罕有所闻。”因此,他创办厦门大学后,就开设了商学、工学等部,到1930年便扩展到文、理、法、商、教育五个学院,分设工商管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等十七个系。

当今的世界,经济的竞争关键在于教育的竞争。陈嘉庚在六十多年前就意识到这一点,提出了“商战中之寓夫学战”的观点,实在是高人一筹,令人敬佩。

(四)陈嘉庚认为,兴办教育是国民的义务。他曾明确指出:“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1920年,他在筹办厦门大学的演词中也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尝观欧美各国教育之所以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强,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中国欲富强,欲教育发达,何独不然。”二十年代,他鉴于军阀混战,政府腐败,便大声疾呼:“现下政府切不可靠,贵吾民自奋发为要。”“夫当局诸公,既不足与之言兴学,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当急起直追以尽天职,何忍袖手旁观,一任教育前途之深炭。且兴学即所以兴国,兴国即所以兴家。世之积金钱以遗子孙者,莫非为兴家计,既要兴家,则对于兴国之教

育不可不加之意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陈嘉庚对教育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关系，是有着深刻的认识的。而从实际行动上看，其兴学时间之长，办学范围之广，捐资数月之后，兴学用心之苦，办学毅力之强，都是无与伦比的。正如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长黄奕欢所说：“在全部华人的教育事业史上，嘉庚先生前无古人的。”

二、“与同业竞争，要用优美之精神与诚恳之态度”

道德作为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人们总是从事的一定职业。因此，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是抓好道德建设的重要环节。职业道德是人们在职业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职业行为规范。它是道德原则的具体化和必要补充。

在职业道德建设方面，陈嘉庚也为人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陈嘉庚是海外华侨开拓实业的先驱，是华侨史上第一个打破英国垄断资本垄断局面的大工商业家。他经营企业的时间，从1890年在“顺安”米号习商到1934年陈嘉庚有限公司收盘结束，共四十四年。他经营过商业、种植业、工业、航运业和报业。他的企业在全盛时（1925年）拥有工厂三十余所，商店百多处，胶园一万五千多亩，雇工达数万人，总资产一千二百万元叻币（约值黄金百万两）。他的营业活动几乎全部是在国外进行的。在新加坡、马来亚那样典型的殖民地社会中，陈嘉庚能够顶住殖民地垄断资本的排挤压迫和同行的剧烈竞争，从父亲破产的事业发展到那样巨大的规模，完全是由于他具有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和善于经营的本事。而且，更为可贵的是，在艰难曲折的经营过程中，他始

终体现出高尚的职业道德。陈嘉庚职业道德的主要特点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与同业竞争，要用优美之精神与诚恳之态度。”

作为一个资本家，其职业特点当然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而且要在与同业的竞争中，千方百计地获得更高的利润。而陈嘉庚这个奇特的资本家，其“优美之精神”最本质方面的是他追求利润的目的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想把它留给子孙，而是通过自己从事的职业来为全社会服务。他平生很喜欢引用西方的一句格言：“金钱如肥料，撒去方有用。”他常说：“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公益义务既需吾财，令子贤孙何须凭籍。”“我金钱取诸于社会”，亦当“用诸于社会”。这就是陈嘉庚最可贵的职业道德。

陈嘉庚一生艰难创业所得的资财，几乎百分之百地用于兴学、救灾、支援祖国抗战等社会公益事业。他一生献给文化教育事业的钱，按照黄金价格计算，相当于人民币一亿五千万万元。从1912至1934年的二十二年中，陈嘉庚的实业盈利共899万元，而他拨给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经费就达900万元。他不但倾其所有盈利来办学，而且不惜变卖自己的家产来维持学校的经费。他“出卖大厦，维持厦大”就是突出的一例。1930年，他的企业处于日益亏损的逆境中，他创办的厦门大学经费也跟着发生了困难。陈嘉庚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把自家在新加坡经禧律唯一的一座别墅卖掉，把款汇给厦大维持经费。

陈嘉庚还常说：“应该用的钱，千百万也不要疼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钱也不要浪费。”他是这样的，也是这样做的。于公，他慷慨地捐出千万资财；于私，他俭朴淡泊，锱铢必较。他

艰苦朴素的作风到了令人难于置信的程度。解放后，他回国参政，人民政府给他的工资是三级，每月可领 390 元，加上地区补贴等共计 539.80 元，但他规定自己的伙食费每月 15 元，交待炊事员严格掌握不得超过，其余的钱全部捐为扩建校舍之用。

陈嘉庚还以“针无两头利”为训教导自己的子孙说：“我既立意为社会服务，当然不能再为子孙计；若兼为子孙计，则不能尽量为社会服务。”陈嘉庚逝世时，以他的户头在国内银行的存款尚有 334 万 2 千元。按照他的遗嘱，全部捐给公益事业，一分钱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

陈嘉庚在金钱观和儿女观上所体现的崇高美德、堪为我中华民族的一大瑰宝。

讲求信誉，诚以待人，这是陈嘉庚职业道德的又一明显特色。陈嘉庚代父还债一事，最能说明他轻财重义的品质了。1904 年，陈嘉庚父亲陈杞柏所营企业倒闭，负债二十余万元。按照新加坡的法律，“父债子免还”，父亲欠的债，儿子不负任何责任。但毕生以诚信为准则的陈嘉庚，虽当时经济上处于窘境，却召集债权人宣布：“立志不计久暂，力能作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经过三年的独立经营，陈嘉庚有些盈利，他便不顾亲朋的极端反对，以罕见的轻财重义的气魄，还清了父亲欠下的全部债务。这件事被公认为是一件了不起的义举，陈嘉庚也出乎他意料之外地在华侨社会获得很高的信誉。

在经商的过程中，陈嘉庚也非常信守商誉，强调货真价实和热情服务。他在自己制定的《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上，印出了八十条训词，如：“货真价实，免费口舌，货假价贱，招人不悦”；“门市另售定价不二，以昭信用”；“货物不合，听人换取，

我无损失，人必欢喜”；“货品损坏，买后退还，如系原有，换之勿缓”；“以术愚人，利在一时，及被揭破，害归自己”；“待人勿欺诈，欺诈必取败，对客勿怠慢，怠慢必招尤”；“谦恭和气，客必争趋，恶词厉色，人视畏途”；“视公司货物，要如自己货物，待入门顾客，要如自己亲戚”；“招待乡人，要诚实，招待妇女，要温和”；“顾客遗物，还之惟谨，非义勿取，人格不敬”等等。

更为高贵的是，规章一经定出，陈嘉庚便要求一概严守章程，做到有章必循，违章必究，即使是自己的亲人，也不例外，有一次，他的一个儿子向公司借了五十元钱，逾期未还，陈嘉庚查到后，立即派人将儿子找来，狠加批评，限他从速归还，严令痛改前非。其他职员见他对自己的儿子尚且如此严格，谁敢不自觉遵守规章制度，因此各项业务井井有条，浑然尤如一体。实际上，严格遵守规章制度，这本是一切职员的起码的职业道德。

在职业道德上，陈嘉庚有别于一般资本家的，还表现在他躬身自处，身教胜于言教。在企业未发达时，他的勤谨经营不用说，就是在成为拥有上千万元资产的大资本家后，他也不象当时许多大资本家那样另聘经理管理企业，自己只当后台老板，而是自己担任公司的总经理，亲自指挥全公司的业务。据他第五个儿子陈国庆回忆说，每天早晨六点四十五分，陈嘉庚就和陈国庆坐车离家，七点正抵达树胶熟品制造厂，亲自巡视工厂的各生产部门，严把质量关。他的工厂生产的熟胶品，出厂前必须经过化学房、试验房、药房部三道检验，质量合格才能出厂销售。

目前，我们在职业道德建设方面，强调发挥各级领导的表率示范作用。在这方面，陈嘉庚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三、“欲谋民族之复兴，一切改革必须力求其彻底”

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史，也是不断除旧布新的改革史。改革的发展，必然要使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陈腐观念和旧的传统习惯受到猛烈冲击，也必然把精神文明建设向前推进。

对改革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陈嘉庚也有所认识。他早就精辟地指出：“工业需要革命，文化也需要革命，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就是心理的革命和人格的革命。如果人人人格不加改革，心里不加改革，就是满清推倒，袁世凯打倒，军阀弄倒，也是无用，不惟无用，地方更要纷乱。我说，革命可分公私二种，工业的革命，文化的革命，政治的革命，这是公的，心理的革命，人格的革命，这是私的。”“吾人以欲谋民族之复兴，一切改革必须力求其彻底。大而一国之政体，小而一身之衣服，举凡悖理之法，失时之制，皆宜以大刀阔斧斫伐而铲翦之，务使全部皆呈新气象；然后，‘复兴’二字，始有足言。”

早在满清封建统治时期，青年陈嘉庚就反对迷信，讲究科学。1896年，他在新加坡看见日本横滨中华会馆印行的一本药书《验方新编》，书中详列各种疾病的诊治。他联想到国民愚昧无知，不懂科学道理，一旦得病，则信迷为鬼神作祟，便求签画符，枉送了多少生命，“窃念吾闽乡村常乏医生，若每村有此书一本，裨益不少。”于是，他便数次汇款托其代印六七千册，免费散送闽南各乡。1902年他回国前，又汇款定印五千册。随后，他又在上海、北京等地出广告，广征验方，并请专家修订。这一举动闪耀着青年陈嘉庚崇信科学，普及科学的思想火花，也反映出他懂得在文明建设上应以立代破的道理。有着眼于建设的初步意识。

对于国内及南洋华侨社会中流行的各种颓风陋俗，陈嘉庚十分厌恶。他把革除各种陋俗提到关系国体文明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一切陋俗“侮辱国体，妨害进步”，指出：“习俗误人，至为可畏；须知人心放纵而易，收拾难。”

陈嘉庚以身作则在自己领导的社团组织中进行移风易俗。1923年，他接任怡和轩俱乐部总理（1930年改称为主席）。这个当时被人们称为“百万富翁的俱乐部”，原来只是个“嫖赌饮吸的地方。陈嘉庚上任后，就大刀阔斧地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整顿会风，严明纪律，禁抽鸦片，禁止赌博，规定周六宴会必须准时出席，筵席或吃便饭均用公匙公筷，在三楼设立图书馆，开展读书活动。而且，陈嘉庚还大胆革除几十年来只限闽帮富侨才能入会的旧规，欢迎各帮名流入会。他对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帮派传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他的领导下，终于把怡和轩改造成为组织南洋华侨开展政治和社会活动的重要阵地，使它“一跃而成为卧虎藏龙的所在”。

1929年，陈嘉庚被公举为改组的福建会馆的主席。他在改革会务，组织公益事业的同时，又大力倡导改革丧仪奢华等旧俗。他在福建会馆组织一个丧仪改良委员会，发表宣言，并在报上大造舆论，又组织青年学生到六个区进行宣传，最后则召开闽侨大会，他亲自发表演说。大会制订了闽侨公约，规定人死后停柩三天出殡，亲友勿设宴及赌博等。为使此事得到落实，他还责成福建会馆各区负责人，“每逢丧事亲往劝诫”。经过多方面做工作，这一类陋俗在星马各地得到了普遍纠正。

对二、三十年代国内普遍遗留的满清服饰，陈嘉庚也大为反感。他特地撰写《复兴民族与服制》一文，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上，详述长衣马褂之弊和改革民族服制的重要性。他提

倡男子改穿中山装或西服，女子则穿短衣长裤或仿效西服，并提出国民服装应当以维新、经济、美观、大同、有恒等五项为标准。他还多次向立法院和国务参政会提议改革民族服制。

对于卫生问题，陈嘉庚更是十分重视。他认为：“维新之道，莫重于卫生，人民身体之强弱，寿命之长短，与国家之兴衰，极有密切之关系。”他亲自写了《住屋与卫生》一书陈述了住屋与环境卫生的重要性，运动、洗澡与健康的关系，分析了我国存在的问题，提出改正的办法。

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嘉庚又撰写了《民俗非论集》一书，评述“嫁娶丧葬，浪费铺张；演戏酬神，昼夜聚赌；无谓应酬，酒食征逐；迷信风水，停柩不葬；少年早婚，蓄童养媳”等陋俗的危害，并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措施。

还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在精神文明建设上，陈嘉庚还能正确认识发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与对外开放、向外国学习的关系。中华民族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民族之一，中国已有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陈嘉庚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一再充分肯定，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认为发扬中华文化是“救国保种之道”。1933，正当我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他常以波兰被沙俄吞并后，波兰因保存其固有文化而得以胜利复国为例，吁请同胞们注意发扬和保存中华文化。他指出：“侵略者得以灭人国家，占人土地，终不能灭人之固有文化。世界任其如何变动，我国固有之文化精神，万不能残缺，此理甚明也。”“将来世界如何变动，祖国当局，无论是那条路，亦须保留我国文化，乃能维持民族精神。”

另一方面，陈嘉庚又不夜郎自大，闭关自守，针对我国的一些弱点，他认为应该学习文明国家的先进东西。比如，对体

育运动，他对比我国与一些文明国家的差距，希望国民务必象文明国家那样重视体育。早在1917年，他就说：“世界文明国不但学生重视体育，为人毕生亦未敢放弃，且属尚武精神，对于国家，尤为重要。……我国学生父母，爱子如金，至一闻运动会，则生反对，其阻碍体育为何如哉。……深愿学生父母猛然省悟，作有益之爱为本。”在陈嘉庚的倡导下，他创办的集美学校对体育运动就十分重视，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培养了一大批体育人才。如三十年代初，福建省男子田径22项最高纪录中，集美学校就占了16项，女子田径11项最高纪录均为集美学校所创。“文革”前十二年中，集美侨校就为祖国培养了10名国家运动健将，35名国家一级运动员，90多名国家二级运动员和一大批国家三级运动员。

今天，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精神文明。它要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在陈嘉庚身上，集中体现我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优良传统。正如廖承志所说：“海外华侨世代相传，有不少的优良传统，如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团结互助，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热心文教和社会福利事业的优良传统，以及勤劳、勇敢、朴实的传统。嘉庚先生是兼而有之，并且加以发扬光大。”陈嘉庚身上所体现的优良传统和他对精神文明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审慎扬弃 择善而从

——谈陈嘉庚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

王 祉

陈嘉庚先生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幢幢宏伟壮美的校舍大楼，也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丰富宝贵的精神遗产。

许多研究陈嘉庚的学者都赞叹道：“真是说不完的陈嘉庚！”的确，嘉庚先生的思想是博大精深的，但这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由于他处在我们祖国历史转折的伟大时代中，始终立足民族利益，既勤奋学习，又刻苦实践的结果，是由于他既善于批判地继承我们中华民族悠久优良的文化传统，又善于有分析地吸取国外一切先进的思想文明的结果。

嘉庚先生并没有写过有关中西文化比较的专著，但他一生的言行却足以使我们能够窥探和断定他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基本立扬、观点和方法。在目前我国实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史关头，整理和学习嘉庚先生在这个方面严肃的实践和深刻的见解，无疑将发人深省，十分有益。让我们从具体事物谈起吧：

龙舟湖和游泳池

当四方宾客乘车来到福建省十佳风景点之一的著名的集美美学村游览时，沿着滨海石砖大道往前走，一到了转弯处，蓦地豁然开朗——一泓宽广浩淼，水光潋滟的龙舟湖呈现在眼前。龙舟湖的湖畔及湖心，点缀着七座金碧辉煌、古色古香、典雅别致的楼台亭阁，真是美不胜收。每年的端午节，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龙舟比赛，以纪念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极其杰出伟